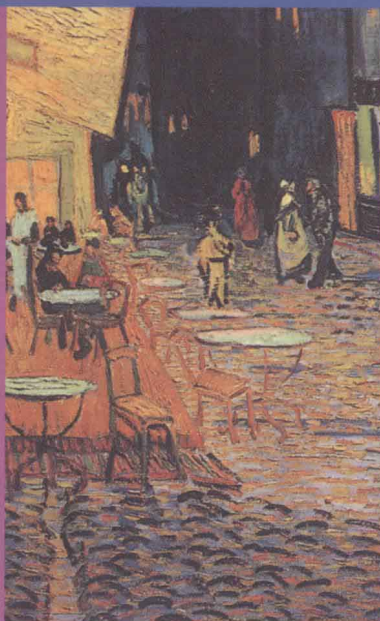


學術著作 ◆ 大專用書

政 治 學 的 知 識 脈 絡

石之瑜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政治學的知识脈絡

石之瑜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1PF9

政治學的知識脈絡

作者／石之瑜（28）

責任編輯／劉璋琦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話：(02)27055066 (代表號)

傳真：(02)27066100

劃撥：0106895-3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發行人／楊榮川

門市／五南文化廣場

總店：台中市中區 400 中山路 2 號

電話：(04)2260330

沙鹿店：台中縣沙鹿鎮 433 中正街 77 號

電話：(04)6631635

逢甲店：台中市西屯區 407 逢甲路 218 號

電話：(04)2555800

高雄店：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90 號

電話：(07)2351960

排版／五南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和鑫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容大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訂／一絃裝訂行

中華民國 90 年 3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2384-6

基本定價 8.2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銘感辭

這本書記錄的，是我在政治學研究中虛渡二十五年光陰後的反省，其間的思考、研究、寫作與編校，為許許多多的人帶來過麻煩。首先，兩岸知識界與實務界的長輩包括胡佛、徐佳士、李亦園、楊國樞、馬漢寶、張厚安、袁頌西、黃俊傑、楊樹標、吳庚、蔡政文、嚴謹、姜殿銘、魏鏞、曹俊漢、翁松燃、蕭敬、楊日旭、陳鵬仁、葛敦華、韓效忠、江顯新、呂亞力、張麟徵、都淦、Peter Van Ness、Bob Cassidy 等人給我許多提攜。尤其是胡老師，總能在思緒最低落之際，有一針見血的提示，常常即使已近黎明時分，他仍開導不懈。

若干好友不斷地激勵我，忘年交如趙春山、李銓、石遠書、大川、李國雄、開煌、振國、Jonathan Adelman 處處幫忙與指正；同事高朗每次主動為我在生涯上、研究上排難解紛，委實感念最深；志誠、復生常關心近況；高宣揚、黃光國、黃進興、廖朝陽、陳昭瑛、呂學海、顧燕翎、懷恩、雲漢、玉山、袁易、思賢、亞中、陽山、銘實、炳南、宗懋、渙銘、中閔、閻初、思儉、林端、念祖（Andrew）、Lynn White、Merle Goldman、Liz Perry、David Goodman、Martha Cottam、David Blaney、Sherry Gray、Stephen Levine、Stephen Walker 在知識上全面地啟發我；大川、競涓、昭琪、念祖（Nigel）則甘心地作為我精神上的最後防線。

大陸知識界也有惜臭者，我十分感謝陳筠泉、姚介厚、白鋼、蕭功秦、謝遐齡、葉坦、宋永毅、王紹光、張小勁、宋新寧、辛旗、李義虎、楊劍、徐勇、趙全勝、吳國光、王希、陳閩、章嘉琳、王飛凌、王友琴、龔小夏、任越、郭建、裴敏欣、周原、李國林、李東紅、楊明偉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知識界的同仁不擇時地的指點。

家裡的讀書會進行了超過十年，我從中國大陸事務學會的學隸那兒，學到的比付出的多；政大東亞所前來以球會友、以茶會友的好學之夫，讓我不敢須臾懈

怠；而充芋在政治學系的籃球隊教練這十多年來，其間曾有倦怠，但年輕人不斷催喚我回到球場，靈感與生命力得以源源不絕。

行政上對我支持最大的，是在蔡政文、許慶復、包宗和、明居正率領下的台大政治學系辦公室同仁、國科會的研究計劃、中流文教基金會、中國大陸研究學會、臺大國家發展所、中山大學政治所與社會科學所、高等政策研究中心等。在不景氣的市場中，出版界仍有瀚蘆、五南、桂冠、三民、揚智、世界、商智、正中、海峽、永然等愛書人願意為知識界做賠本生意，促我不斷前進，每能決心拋下昨日之我。

台灣大學出版社花了九個月的時間審查後，決定不出版這本書，但非常慷慨地與我分享審核群激烈的指控，這適當地提醒了我，有關政治學議程與知識論的探討，難免對學術界造成情感不安與行動反彈。這些學術政治都是知識的重要內涵，不是不相關的生活現象，啟迪我爾後的研究方向。

這本書的許多章節曾經以各種面貌陸陸續續發表過，這些大方寬容的編輯們來自《戰略與管理》、《共黨問題研究》、《美歐季刊》、《婦女與兩性研究學刊》、《中國大陸研究》、《政治科學論叢》、《問題與研究》、《東亞季刊》、《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

父母對我的叮嚀呵護至今不斷，他們身體不好，而我用學問反饋不了，卻還老佔用他們見我的時間。內人和孩子都愈來愈能容忍我熬夜、出國，反而是我捨不得。我常擔心憂慮他們，他們更常擔心憂慮我，他們的身影與鬚髮在我腦海裡，勾織成這本書不可或缺的知識脈絡。

高序：台灣的政治學理論危機與命運

當代消費與資訊社會的膨脹，大大地沖淡了人們的理論興趣。在人類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理論的命運一再地受到挑戰，並遭遇到各種危機。一般地說，理論本身受到挑戰並遭遇危機，並不是一件壞事。這是因為一方面理論的發展，本來就需要不斷地更新，以便擴展和增長理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社會歷史的發展以及發生於其中的人類實踐，也會強制性地迫使理論不斷地進行新陳代謝，以適應整個人類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需要。不論就理論本身的發展邏輯或就社會實踐同理論的關係而言，理論的危機，往往是在社會發生急遽轉變、而人們又陷於思想麻木的境遇時發生的。但在許多情況下，社會實踐的歷史性轉折所帶來的理論危機，總是同時地激發著人們的理論創造性活動。因此，並不是在所有的社會歷史轉折時代，就必然導致理論創新生命力的衰竭；相反，它卻為具有創造精神的成群思想家的湧現創造了條件。因此，問題並不在於社會歷史本身的轉變所決定的各種命運或遭遇，而是在於從事實踐的人們是否具有理論思想的敏感性。

在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的轉變時刻，實際上產生和存在著影響理論創造的兩種既有區別、又相關聯的社會和文化環境。第一種是源起於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所發生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革命，第二種是與此相伴隨的消費與資訊世界的膨脹及其對於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這兩種力量及其相關因素之間，雖然是相互依賴、並相互滲透的，但畢竟對於這一歷史時期的理論命運，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從目前的趨勢來看，至少就台灣社會和文化生態結構及其走向來看，第一種力量和因素似乎有逐漸地被第二種力量所壓倒的趨勢。不用說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的重要思想家的理論遺產，就連近四十年來活躍於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理論大師的作品，對於新一代人來說，不是陌生，就是根本不予理睬。這不只是一種理論危機，而且也可以說是整個社會和文化的危機；這不只是必須由新一代人承當責任，而且也是在這消費和資訊氾濫的時代中，應該由包括理論家和政治家在內的所有人群認真深思的問題。

我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政治學家。只是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個人的思想成長與社會經歷促使我養成了一種對於理論的特殊興趣；面對當代人們對於理論關

懷的削弱，自然地形成了一種精神憂慮。所以，當之瑜邀我為他的新著寫序的時候，我欣然同意，並想藉此機會闡發對於理論建設的點滴關懷心情。

處在整個理論界陷於蕭條、又面臨著形形色色遠離意義的符號遊戲不斷威脅理論創造的時代，之瑜兄這本書的優點及其深遠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在全球化的新年代裡，談論有關政治學理論建設的任何一個問題，當然離不開已經佔據優勢。並已在整個世界佔主流的西方近現代政治理論和制度。台灣近二十年來的政治改革，使自由民主政治制度開始建立。但是，不同於西方各國實施自由民主制度的歷程，台灣政治制度及政治生活，卻出現了許多怪現象。怪就怪在這些現象是發生在台灣社會正朝向政治自由民主化的方向發展的過程中。究竟是原有於西方政治理論與制度中的弊病所引起，還是由於台灣社會本身在內在因素所決定，這是值得台灣政治學家和政治家深思的重要問題，也是選擇了這一方向的台灣人民所應該嚴肅思考的問題。它既是實踐的問題，更是理論的問題。

為此，我想趁此機會提及關係到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的兩件事。第一件事，發生在一年多以前的台灣政治學碩博士論文發表會。我有幸對一篇政治學碩士論文進行評論。當我提到需要回顧古希臘思想家的基本理論時，年輕的論文作者說出了一句令我驚訝的回應。他以不屑的態度，將希臘的政治理論稱為早已過時的陳詞濫調。殊不知，近現代西方政治理論與制度，皆導源於希臘城邦的政治理論與制度，歷經千百年不斷的陶冶與加工，才在文藝復興與啟蒙時代，形成為較為先進的當代自由民主制度。在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理論與制度中的精華，是從希臘城邦時代的卓越理論家和政治家所奠定的。亞里斯多德在他的《政治學》和《尼克馬可倫理學》中強調，作為政治動物的人，必須在其活動中將言語（*lexis*）列為優先地位，並以貫穿著理性的言語指導其一切行動（*praxis*）。

真正的政治家不是單憑權謀或暴力，而是以恰當的、具有說服力的言說進行活動。顯然，政治家的任何政治行動，既不是單靠毫無內容的「說話秀」，也不是迷信於強制性行動（甚至是暴力）。更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方，不只是政治家，而且社會共同體的所有成員，作為公民，也必須學會和養成在說理中進行政治活動。這就是貫穿於西方政治理論與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傳統，也成為了近現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礎。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是政治學理論所必須一再強調和發揚、而被相當多的台灣人所遺忘的東西嗎？

第二件事，是我在法國度過的二十幾年生活中所看到的實際自由民主制度及

其運作過程。在法國作為政治家，首先必須具備深厚的理論基礎，不只是政治學領域內的理論，而且也包括整個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基本理論。因此，國家領導人，要經歷在高級專門政治學院及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薰陶之後，才有資格升入最高層次的國家高等行政管理學院（L'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與此同時，必須經歷從最基層的市政府民意代表及市長的實際考驗。至於法國廣大人民大眾，不論就其自身而言，還是從國家的角度，都很重視公民意識的培訓和薰陶。法國人大概不會忘記孟德斯鳩說的一句名言：「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國家」（tel peuple, tel État）。

對於台灣政治學理論及實際政治生活的未來命運，我是寄託於年輕一代的基礎理論訓練。這是非常複雜艱鉅的任務。令我愉快的是，之瑜寫的這本書，已經朝著希望的方向邁步。關鍵的問題，不在於誰最有理論涵養，而在於一種態度。正如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說，現代性歸根結底是一種態度問題。身在現代性中，特別是已進入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當代，面對洶湧而來的各種物體堆積與符號資訊的遊戲，政治學者、政治學家以及每一位公民，究竟對自身與社會的命運抱什麼樣的態度，這是關係到理論與社會本身的前程。法國思想家保爾·李克爾（Paul Ricoeur）指出：人類社會和文化始終伴隨著惡的象徵性，這不僅是人類的悲劇，也是人類的希望。惡的象徵性使政治難免有惡的性質，但同時卻激發善的力量透過種種迂迴的中介帶領人們走向希望。

高宣揚 序於臺北士林外雙溪
東吳大學教授宿舍
2000年聖誕節

朱序：華人社會政治學的拓荒手記

之瑜的新著《政治學的知識脈絡》一方面充分反映了他對知識探索的執著，一種近乎神學家對探究經文真義的執著；另一方面高度體現他思惟框架所蘊含的全面性、顛覆性與原創本質，他像是一位華人政治學社群內的無政府主義者，抱持讓一切知識信條與知識權威崇拜歸零的壯烈企圖。

這本書的章節緊緊圍繞著兩個核心主題：第一、政治學是否有可能「科學化」，以及是否應該「科學化」的問題；第二、政治學是否應該「本土化」，以及如何本土化的問題。很多受正統美國社會科學訓練的學者，可能會質疑頭一道問題是在方法論博物館中蠟封半個世紀的古早問題，「政治科學家」早在五十年代就找到了這個問題的正確解答，半世紀以來根本沒有應該不應該科學化的問題，只有如何科學化的問題。其實不然，我們如果認真追蹤社會科學哲學領域的演進，就會發現這個恆古的方法論議題一直存在著檢討與辯論的空間，隨著知識社群對於自然科學的本質以及與科學方法論的認識產生改變，隨著社會科學家對於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本質異同之理解出現修正，隨著知識社會學對於科學知識活動所隱含的意識形態束縛、權力關係與社會分工本質的揭露，政治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與回答也開始推陳出新。尤其近年來，歐美政治學出現明顯的兩極化趨勢，一方面狂熱的「理性選擇學派」學者，試圖以經濟學作為政治學科學化的標竿，樹立一個唯我獨尊的霸權式典範；另一方面，許多「後實證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追隨者則試圖重新找回政治學失落的人文傳統與人文學科本質。這兩股知識潮流的交鋒，正顯示出這個恆古議題歷久彌新，之瑜的新著正帶領我們進入這場世紀交鋒的最前緣。

我們如何面對政治學的本土化問題，與我們如何回答第一道問題息息相關。如果我們篤信社會科學知識具有普世性，是超越時空的，而且所有的政治學者所處的結構位置以及所追求的實踐目的均是相同的，政治學就不存在本土化的問題。如果我們接受兩個相反的前提：第一、社會科學知識具有時空（歷史）特定

性；第二、知識社群與社會的關係（透過制度安排與專業倫理來體現）沒有普世皆同的模式，更沒有定於一尊的最佳模式，答案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政治學的知識具有時空特定性，以及在不同的歷史傳承以及發展階段的差異下，不同社會可能根據不同的理念來建構知識社群與社會的關係，來設定知識實踐的目標，我們就無法迴避「本土化」的課題。很多想要迴避「本土化」課題的政治學者，往往不自覺的將「美國化」的政治學當作是普世的政治科學，將美國政治學的發展模式奉為圭臬。其實，美國的政治科學社群是否真的可以作為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典範，是頗值得懷疑的，戰後美國政治科學所標榜的經驗研究傳統，堅持價值與事實的絕對二分，將自己的社會角色界定為教育具備知識的公民(well-informed citizens)，使得政治學者的社會分工角色與跟股市分析師相去不遠，並使得政治學者的研究普遍缺乏批判性，無法發揮學術工作者原本可以提供的社會反省功能，不自覺的扮演維護與合理化現存政治秩序的角色，所以絕大多數的美國政治學者是自外於美國社會的政治改革議題，在美國社會的公共論述與權力運作中佔據相當邊緣化的角色。

由於長期的知識依賴關係，讓很多國內的學者失去對於美國政治學發展模式的反省與批判能力。相反的，歐陸的政治學者就一直有意識的從「過度美國化」的陷阱中掙扎出來，所以可以發展出有別與美國主流的理論觀點與學術傳統。這不僅是因為歐洲國家在全球體系內所處的地位不同，也是源於歐洲學術社群承襲不同的文化脈絡，以及鑲嵌在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結構之中，對於什麼是一種合理與正當的國內與國際秩序，有不同的價值判準，不同的想像；同時，一般而言，歐陸的社會科學社群與國家機構與資本家的資源依賴關係比較鬆散，因此表現出較高的學術觀點多元性，也因此批判性的觀點在歐陸的學術社群也有較大的生存空間。之瑜對於政治學本土化議題的探討，在在提醒我們，一個政治學社群的知識建構活動，深受其所特有的社會結構關係以及意識形態傳承的影響，這些條件塑造了社會科學家的自我定位、社會分工角色，以及與其他社會部門的資源依賴與交換關係；同時也深刻影響一個學術社群內部的組成方式、專業規範、思惟方式，以及學術風格。因此沒有所謂要不要本土化的問題，只有「自覺成分高」的本土化與「自覺成分低」的本土化之分，只有「優質」本土化與「劣質」本土化之別。

之瑜對於政治學科學化與本土化議題的探索既徹底又全面，他深入當代西方

政治學的知識源頭，透過對於歐美政治學四個核心概念——國家、社會、理性、權力——的回顧與檢討，他讓我們回到歐美主流思維架構的地基層，以及回到中西歷史經驗參照與學術傳承交匯的源頭，這是一座極難攻克的知識大山，但之瑜抱持著「車到山前必有路」精神，劈荊斬棘羣路藍縷，既令人感動，也令人感佩。那麼多年來，之瑜所從事的正是為華人社會政治學重新打造根基的學術本土化工作，從事這種知識拓荒工作經常要忍耐「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孤寂與淒涼境界，之瑜是華人政治學社群裡先知先覺的拓荒者，這是一本動人心弦的拓荒者手記。

朱雲漢 伏案於拾翠山莊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

吳序：政治學是科學嗎？

之瑜和我在小學和初中同校（復興）、高中同班（建中），在大學時同系（台大政治系），現在是同事（又是台大政治系），可說是有「五同」關係，總之是淵源深厚。他回國這些年來，一直在國內的政治學界提出一些另類的看法，挑戰政治學的主流，讓我很佩服他的氣魄。之瑜著作等身，用功的程度旁人難及，又努力在國際上爭取發表的機會，因此雖然他的方法論獨樹一幟，但是這些年來也逐漸受到學界的肯定，得到許多的獎項，這些都讓我為這位老友高興。此番又要出書，囑為之序，我也樂於從命。

一般學界對於之瑜著作的印象有四個：各類著作極眾、批判性格強烈、獨創心理分析，以及推論邏輯不易瞭解。這本《政治學的知識脈絡》與其說是之瑜又一本政治學論著，不如說是他對於政治學這個學科基本態度的總說明。讀了這本書，可以讓人瞭解我的這位老友的核心觀點，以及上面所說的有關他著作的四項特質。

之瑜是不相信政治學是一門科學的。他是以政治學中的科學主義，和歐美中心的「主流政治學」理論為敵的。他認為政治學是喬裝與粉飾成科學，其實是一種政治主張。因此例如比較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都是獲得了包括中央情報局在內的美國各政府部門大量挹注；政治發展研究是為冷戰服務的；新制度主義是協助比較政治學從比較共黨的議程上蟬脫，轉移成具體地研究各國特殊的交易障礙；而全球化實為前共黨統治地區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回歸正常的催化劑。質言之，歐美（主要是美國）所主導的主流政治學是為西方的利益服務的。而在台灣的政治學者，如果接受了「政治科學」，號稱客觀，則背後必然有特定的利益與目的。所謂「為了取得權位，今天若干叱吒風雲的政治學家並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妥當地運用泊來的知識，反而形成另一股風氣，正在使年輕的政治學者可以寡廉鮮恥地在媒體上侃侃而談，目的充其量是在幫助自己依附的政治幫派粉飾」。這樣看起

來，政治學界沒有學術中立或客觀可言，主張或使用政治科學語言的，大約都是這個或那個黨派的御用學者。

這樣強烈的批判語言，讓人想到馬克思主義中的知識社會學，也就是馬克思對於「意識形態」的看法。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建築在階級利益之上的，是用來說服無產階級接受資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工具。在《政治學的知識脈絡》當中，我們果然可以發現相當濃的新馬克思主義、後現代學派、女性主義學派和後殖民主義學派等的思路。這些都是對於主流政治學大加抨擊的。不過之瑜的批判是更徹底的，他把各家批判學派也拿來批評一番，指出很多這類的人士都是身處歐美國家的亞、非裔學者，他們的批判主流政治學是為了想在學術體制當中獲得認可，他們甚至跑到祖裔國家去聯合當地的本土學者，共同抗拒歐美中心的政治學。這樣說起來，每一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來搞學術，批判學派不過是用批判來出頭。

之瑜對於主流政治學的顛覆到了不承認國家是一個有效概念的地步。就像新馬克斯主義學者認為把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現象當成實存研究，就是維護資本主義一樣，之瑜認為把國家視為客觀的實存，就是鞏固了它的存在，也就是支持了國家制度。他似乎在用學者對於國家的態度來把政治學界兩分：接受和不接受的（不接受還分徹不徹底），凡接受國家概念的就是接受歐美中心的主流政治學，不接受國家概念的就是某一種批判學派，而他自己是最批判的。

如此理解了主流和批判學派的政治學後，之瑜將他的關心焦點集中到中國，那裡是他的終極關懷。他檢討了各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和批判主義的理論，探討它們彼此之間的關聯。他提到中國的政治學者對於自由主義是嚮往的，而新左派和新保守主義則為了反對西方而合謀對抗自由主義。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觀察。他又認為中國政治學者的工作，是提供一種語言，能適當地表達中國人政治行為中的情感傾向。換言之，就是中國人的政治學。在這裡，我們終於看到了之瑜在批判了歐美政治學和批判政治學後，真正想要建立的東西。那是一種以中國人的民族情懷和歷史感覺為基礎的政治學。

《政治學的知識脈絡》是對於政治科學的反思。在第一部分它批評了主流政治學裡面視為理所當然的一些概念（國家、社會、理性、權力），認為這些概念反映了特定的主張和利益。在第二部分，這本書提出了本土化的問題，要求用本

土的語言、回答本土的問題，這也是對於歐美政治學的反動。《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可以被歸類為批判性的知識心理學，就是藉著對於知識的心理基礎來說這個知識不如它所宣稱的客觀中立和普遍。原來知識應該是針對事實而說的，但是如果知識的構造和傳佈是基於當事人心理的需求，那麼知識的地位就崩陷了。之瑜就是用這個方式來對待主流的政治學。而他自己的主張，則是表現在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本土的政治學。

這樣整體的看過一遍之後，我們發現在之瑜的推論過程當中充滿了心理分析的痕跡，好似在說這個理論那個理論會如此如此是因為理論家們要滿足這些那些的心理要求。然而，究竟有哪些要求是典型的，它們又通常是會透過什麼樣的思想或行為來滿足，在之瑜的作品當中並不是都很清楚。於是讀者或許會覺得這一個或那一個論斷頗有道理，但是他們無法在相同情境下自己得到同一個論斷，因為之瑜的心理分析似乎沒有規則可循。之瑜的詞藻極其豐富，常見古文蹤跡，在目前的社會科學文章當中非常罕見。他又喜歡層層演繹，透過字句的精巧構作來達到加強的效果。獨特的心理分析、豐富的文學辭彙和繁複的邏輯演繹讓之瑜的文字獨樹一幟，但是並不好懂，不過作者顯然樂在其中，而讀者也常歎為觀止。

我和許多國內的政治學研究者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什麼「主流」的政治學者，但是被之瑜老友歸入這個陣營當中。我很能體認在歐美學界發展他們的政治學時，必然摻雜了很多文化上的價值和假設，而這些價值和假設並不是舉世皆準的（和自然科學不同）。然而我一直認為要改進西方的政治學最好的方式應該是找出並且剔除這些特殊的價值和假設，甚至在處理我們自己的問題時加入我們自己的假設（但是充分瞭解到這些假設的侷限性），發展出真正一般性的理論，從而使得政治學能夠更為科學，而不是先前認定政治學不可能是科學，然後肆無顧忌的把自己的價值投注到學術當中，並且抨擊其他人的政治分析必然有不可告人的心理動機。台灣是一個價值紛紜的地方，政治學要在這裡發展，學者一定要先將自己的好惡放一邊，提出就事論事的觀察和理論，作為任何討論的前提。價值之爭常是沒有結果的，除非辯爭各方都有必須接受的普遍和共認價值。之瑜的批判常見鏗鏘有力之作，但是由於根本排斥了客觀的可能，因此不免成為己方價值的陳述，對於在價值上相左的讀者而言，恐怕讀不進去。我這位老友或許根本不在意這些，這其實是他可愛和真性情的一面，但是老是把政治學分別陣營，而後以

攻擊批評這些陣營為職志，隨時充滿了十字軍作戰的精神，未免顯得太緊張了一些。總之，之瑜的用功和執著，絕對是令人敬佩的；他對於自我理想的堅持，也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在此謹以這篇序言，和之瑜老友共勉。

吳玉山

識於台大社會科學院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

陳序：當下實況中的政治／學（者）

之瑜終於把他這些年來作政治學研究的方法論筆之於書了！他將思考政治問題的態度、角度、觀念與分析方式等，稱為「知識脈絡」，這毋寧是標示出了一種獨特的立場——我們儘可用各種可能的方法與文化中所累積起的所有資源，去反思或探究人的整個「生活」；而所謂「生活」，「政治」於焉誕生。這是個絕不同於主流政治科學傳統的立場，並與多數現行的研究立場相逕；但正因如此，引起了我的興趣，相信也同樣會引起其他人的深切注意。

之瑜與我原係高中與大學同年之學友，但我大學時期並非讀政治，故到了成為同事之後才切磋往還；或許也因為我早年受政治科學「燻習」較少，故也是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政治的研究——政治思想的角度，而我喜稱之為人文研究（humanities）的角度。如果思想與觀念有臉孔，則我彷彿在之瑜的書中看到了若干熟悉的朋友。

如果我的理解正確，之瑜的政治研究方法論，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信念上的；政治的研究必須本土化，而且是問題導向的；「根據本地正在發生的政治問題設定研究議題的好處是，當我們試圖回答這些問題時，必須瞭解問題的背景，於是強迫研究者必須對當地的社會、文化脈絡，保持經常而完整的接觸，而更有可能發展出一套適當的研究程序，使得本土政治學能真正做到對本土文化的敏感與體會。」這在我所接觸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稱為「學者說他們的語言」；而可以共用一種語言，就稱成了一個群體。這幾乎是人文研究、文化研究或是文學評論中引以為常的觀念與作法，但在當代政治學研究的傳統中卻非如此：一般是使用專業的術語及模型來描述或評估政治現象與行為。於是，現在我們乃有了觀察者的角度與行動者的角度、外部與內部、行為本質與歷史源流、行動與價值之間的著理或對比。基於此，似乎可以將之瑜的政治學視為是「人文研究的政治學」——注重歷史、價值與心理取向，發掘行動者的世界觀，出入於理性與感性之間，徘徊於小我與大我之際。

人類對於政治世界的研究，曾展現出極豐富的風貌與樣式。在西方，史詩悲劇與對話錄，開啟了政治研究的興味；在古代中國，經傳疏論尺牘甚至詩賦小說

都曾含蘊士子對政治問題的觀察。人類在生活之中從事政治，故俯仰呼吸間焉得不思之索之；歷史在最細微處形成文化，而吾人論究世事豈能見樹忘林？有趣的是，西方古代人對政治的研究，今日必須在政治思想史書籍中才能一覽，但是此類書的名稱卻是發人深省：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換句話說，以往多元地研究政治世界的文獻現在基本上已成為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寶藏」，由他們來負責與古代的「政治學家」們對話：懷古之情，固躍然紙上，但後不見來者之感時，亦偶興之。

這本書第一部分討論了國家、社會、理性、權力等概念並以之為研究政治的基礎。如由我自己來對這些概念作處理，大概未必全然與之瑜同調，但我總是贊成用不同的思考方式來對既有學術進行增添附益。畢竟，人類對自身的理解（政治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開發出不同的詮釋立場本身即是不凡的價值。此外，本書的第二部分著墨於政治學本土化之問題，這大概是之瑜所謂「知識脈絡」中除了跨科際以外的最重要的面向。由於研究領域不同，我對於其中所論列的議題及案例並不熟悉，但是卻對「線性史觀」、「零碎空間」、「微觀轉型」及「論述風格」等名詞甚感興趣。從這些獨特的觀察角度我們似乎可看見之瑜將中國研究活潑化、生動化與立體化了——當然，之瑜會說，其實是將它「中國化」了。

在英文中，politics同指政治與政治學，似乎給我們若干啟示：政治學應是對政治生活整體的呈現，而研究政治學的人其實是時刻活在當下的政治實況中的。之瑜的這本書，反覆地為我們說明這個觀念；而這本書的終究出現，或將為此地的政治學（以及政治）帶來新的變數？

陳思賢 於台大社會科學院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